

武汉大学出版社

俄汉 翻译
汉俄

邱榆若 编著

(鄂)新登字 09 号

俄汉翻译
汉俄

©邱榆若 编著

*

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武汉正佳公司文字处理

湖北省罗田县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1/32 11.625 印张 插表 2 299 千字

1993 年 6 月第 1 版 199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

ISBN 7-307-01166-2/H·40

定价:6.10 元

前 言

编者多年来在武汉大学外文系俄语专业讲授《翻译理论与实践》这门课程，本书是在修改多次的讲义的基础上编写而成，并吸收了各类翻译教材的长处以及翻译研究的有关成果。

“俄译汉”、“汉译俄”一直作为两门课程分别开设，近年来我们将这两门课程合并为一门课程（“汉俄互译”）。实践证明，合并开设可避免重复讲授一般的翻译理论原则；在教学中进行两种语言的对比和相互转换，更有利于学生牢固掌握和运用翻译技巧，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翻译教材的编写体系，长期来囿于语言学的范围，以词汇、语法为纲。编者力求按照翻译过程的本质特征以及交际场合对翻译活动的影响，来安排本书的编写体系，尽可能避免单纯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待翻译问题。全书分绪论、理解篇（5章）、表达篇（7章）、文体篇（4章），其中个别章节（科学文体和文艺文体），根据教学要求重点讲授俄译汉；除绪论外，其余各章通过大量实例论述翻译的一般原则，并配备一定数量的练习。书后附有俄汉译音表和汉俄译音表。

编者虽然尽了最大的努力，但由于水平有限，加上这两门课程合并开设的时间不长，经验也不足，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望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1992年6月于珞珈山

目 录

绪 论	1
1. 翻译的作用与类别	1
2. 翻译的标准	1
3. 译者的素养	9
理解编	14
第一章 词汇的理解	17
1. 词的实物-逻辑意义	17
1) 词的意义范围	18
2) 词的多义性	18
3) 词的同义性	21
4) 词的搭配能力	23
2. 词的感情色彩和语体色彩	26
练习 1	29
第二章 语法的理解 (上)	32
1. 汉俄语词的语法意义及其语法手段的对比	32
1) 名词的数	33
2) 动词的时、体	36
3) 代词问题	40
4) 倍数的增减	42

练习 2	45
第三章 语法的理解 (下)	48
2. 汉俄语句法结构及其表现形式的对比	48
1) 主语问题	48
2) 谓语问题	51
3) 定语问题	57
练习 3	63
第四章 修辞的理解	68
1. 比喻	68
2. 俄语的辞格 эпитет (修饰语)	74
3. 借代	75
4. 反复	79
练习 4	81
第五章 语境的理解	85
1. 言辞语境	86
2. 言辞外 (超语言) 语境	92
练习 5	95
表达篇	98
第六章 增补法	100
1. 语义增补	100
2. 语法增补	104
3. 修辞增补	109
4. 逻辑增补	112
练习 6	116

第七章 省略法	121
1. 语义省略	121
2. 语法省略	125
3. 修辞省略	130
练习 7	134
第八章 引申法	136
1. 具体化	138
2. 概括化	141
3. 转译	145
4. 改译	148
5. 反译	152
练习 8	158
第九章 代换法 (上)	163
1. 词类代换	163
2. 成分代换	169
1) 主语的代换	170
2) 谓语的代换	172
3) 宾语的代换	174
4) 定语的代换	176
5) 状语的代换	179
练习 9	182
第十章 代换法 (下)	185
3. 语法联系代换	185
1) 换位	185

2) 转换.....	187
3) 转移.....	190
4. 单复句代换	192
练习 10	200
第十一章 标志特有事物的词和专有名词的翻译.....	203
1. 标志特有事物的词的译法	203
1) 音译.....	204
2) 意译.....	206
3) 音意兼译.....	210
2. 专有名词的译法	212
1) 人名.....	212
2) 地名.....	213
3) 机关团体名称.....	217
练习 11	219
第十二章 成语的翻译.....	223
1. 常用的翻译方法	224
1) 运用等值成语.....	224
2) 运用变体成语.....	224
3) 仿造成语.....	225
4) 解释性翻译.....	228
2. 不同的上下文里同一成语的不同译法	231
3. 用成语翻译非成语的语言成分	232
练习 12	234
文体篇	237
第十三章 科学文体的翻译.....	237

1. 准确翻译科技术语	238
2. 掌握科技俄语的常用结构	245
1) 动名词的翻译	245
2) 结构复杂的简单句的翻译	248
3. 努力学习专业知识	251
练习 13	253
第十四章 公文事务文体的翻译	255
1. 公文事务文体的主要特点	255
2. 部分公文事务文体的翻译	261
1) 商务信函	261
2) 几种俄语应用文的译例	268
练习 14	280
第十五章 政论文体的翻译	283
1. 新闻报导的翻译	286
1) 新闻标题的译法	288
2) 新闻来源的译法	290
3) 新闻内容的译法	293
2. 政论文的翻译	299
1) 准确理解和表达原文的政治思想内容	299
2) 注意原文和译文的用词倾向、风格和 体式的大体吻合	303
3) 长句的译法	306
练习 15	312
第十六章 文艺文体的翻译	316
1. 文学作品翻译的基本原则	316

1) 用形象译形象·····	316
2) 重神似不重形似·····	320
3) 再现原作的风格·····	323
2. 不同体裁的文学作品的翻译·····	328
1) 小说的翻译要点·····	328
2) 诗歌的翻译要点·····	340
练习 16·····	353

绪 论

1. 翻译的作用与类别

翻译 (перевод) 是跨文化的语言交际活动。它是将一种语言或文字所表达的内容用另一种语言或文字传达出来。《礼记·王制》中说：“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唐代贾公彦的《义疏》里说：“译即易，谓换易言语使相解也。”“翻译”一词最初出现在《隋书·经籍志》上：“汉桓帝时，安息国沙门安静，赍经至洛，翻译最为通解。”

翻译通过两种语言的转换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я) 沟通操不同语言的人们的思想，达到相互了解。在促进民族间文化交流与融合中，翻译起着重要的“桥梁”和“媒介”作用。如古代日本通过翻译中国古代诗歌形成了日本“和歌”这一新文体。文艺复兴后，欧洲的传教士、商人、旅行家纷纷来华，翻译了中国的哲学、历史、文学等方面的著作 (如：《论语》、《易经》、《春秋》、《老子》、《庄子》、《礼记》、《诗经》、《赵氏孤儿》、《好逑传》等)。这不仅使西方进一步了解了中国，而且对西方的思想、文化产生过不小的影响。18世纪的欧洲文学，无论是古典文学，还是浪漫主义，都受到中国文化和思想的影响，在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上有了新的突破和发展。中国文学题材的道德主题被法国启蒙派理解成“理性”内容，如法国启蒙主义大师伏

尔泰（Voltaire，公元1694-1778年），在改编中国元杂剧《赵氏孤儿》时，将剧本的副题写成“五幕孔子的伦理”。中国伦理这一主题还反映在伏尔泰一系列的作品中，他曾说过：“我敢说自从我创作《亨利亚德》直至《扎伊尔》，以至这篇中国作品，不论它们的成绩好坏，这个鼓励善行的宗旨是一直给我以灵感的……”诗歌创作中出现了模仿中国古诗的“汉风”的风气，如歌德（Goethe，公元1749-1832年）的《中德晨昏四时歌》抒情诗14首，是模仿中国诗风写的。20世纪20年代美国兴起的“意象派”诗歌，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中国的古典诗词。

外来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有两个时期最突出：一是从东汉晚期至宋代的佛经翻译，二是起于明清之际，盛于清末和五四前后的科技、社会政治和文学作品的翻译。我国的佛经翻译先后相继达千年之久，这个时期是以印度佛教文化为中心的中亚文化艺术的输入。佛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促进了中国文化的进一步繁荣和发展，诚如范文澜（1893-1969年）所说：“没有东汉以后大量佛经的输入，就没有隋唐以后内容革新的文化。”（《中国通史简编》）第二次外来文化的影响，最早起于明清之际。欧洲文艺复兴之后，大批传教士来华，他们的翻译活动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鸦片战争后，西方文化象潮水般涌入中国。从1840年至1918年（五四运动前夕）的70余年间，翻译活动起了思想解放的先导作用和启蒙作用。当时中国已处于被瓜分的亡国境地，在民族危亡的严重关头，先进的中国人，为了振兴中华，向西方寻求真理，翻译了大量西方的社会政治、科学技术和文学艺术著作，传播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和现代科学技术知识。这对加速清王朝的灭亡和促进辛亥革命的爆发起了一定的作用，并为五四运动作了思想准备。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中国带来了马克思主义，诞生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从此中国革命和社会的进步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翻译工作在这个时期曾起过

特殊重要的作用。值得提出的是，以鲁迅、瞿秋白为代表的文学翻译活动，对我国当时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对我国现代文学的革新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翻译事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翻译工作成了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克服了翻译工作中无组织、无计划的现象。中共中央成立了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创办了全国性的翻译刊物《翻译通报》，并对许多重要的翻译理论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1950年召开了全国第一届翻译工作者会议，1954年召开了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翻译作品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有了飞跃的发展，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期。“文革”期间，翻译事业遭到了严重的摧残，粉碎“四人帮”后，开始恢复元气，重新走向繁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政策更加促进了我国翻译事业的蓬勃发展。翻译工作对促进我国人民与全世界各族人民的友好交往，促进各民族的文化交流，促进实现四个现代化，都发挥过并将继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各族人民间的交往最先是口头传达的，将一种文字译成另一种文字，那是有了文字以后的事情。世界上最早有文字记载的翻译材料，据考古发现，要算在公元前3000年古埃及王国(象岛第一瀑布)所在地发现的载有两种文字的文书。西方最早的文字翻译是古希腊、罗马的宗教典籍和世俗著作的翻译，如公元前3世纪古罗马诗人安德尼可斯(又译安德罗尼克)(Livius Andronicus, 公元前284-204年)，将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奥德塞》(又译《奥德修记》或《英雄流浪记》)(《Odyssey》)译成了拉丁文。据我国史书记载，在春秋秦汉之际(约公元前475-206年)就有翻译作品(如《越人歌》、《西南夷传》等)，但后来失传了。我国的佛经翻译，自东汉晚期至北宋末年，先后相继近千年(约公元148-1127年)，不论就其规模之大，时间之久，

译书之多，影响之深，在当时无疑是首屈一指的。

口译(устный перевод)和笔译(письменный перевод)是翻译的两种基本形式。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翻译的形式和类别也日益增多。传统的口译形式是随声传译(последовательный перевод)，本世纪4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一种新的口译形式——同声传译(синхронный перевод)。它比传统的口译形式效果高，能节约大量时间，但是难度大，对译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自战后纽伦堡和东京审判法西斯战犯的国际法庭第一次正式使用同声传译之后，这一口译形式在各种国际会议(尤其在联合国的各种会议)上广泛得到了应用。

电子计算机出现后，本世纪40年代提出了运用这种装置作翻译的设想，并成功地进行了试验。这就是所谓的“机器翻译”(машинный перевод)。机器翻译是应用语言学(прикладная лингвистика)的一个分支，它研究如何利用计算机模拟人的翻译活动，实现翻译工作的自动化。目前，一些较发达的国家已开始将科技资料的翻译中初步使用了机器翻译。我国的这项工作始于1958年，由于种种原因¹，至今尚处在探索研究阶段。毫无疑问，机器翻译的发展，对传统翻译的理论和实践确有重大的意义。

按翻译材料的文体来分，可分为科技翻译(научно-технический перевод)、应用文翻译(официально-деловой перевод)、政论文翻译(публицистический перевод)和文艺翻译(литературно-художественный перевод)4类。按翻译材料的内容，其中每一类又可细分为许多不同学科或专业的翻译。如文艺翻译又可分为：散文、小说、诗歌、戏剧等不同种类的翻译。

有时为了某种特殊目的，还有一些特殊形式的翻译，如节译(сокращенный перевод)、编译(перевод и редактирование)以及外语教学中运用的逐词翻译(пословный перевод, буквальный перевод)。我们通常所说的翻译，是指译文

(перевод) 要确切而完整地表达原文 (подлинник, оригинал) 内容的翻译。

最后, 还应指出, 翻译一般指两种不同民族语 (或文字) 之间的转换表达, 如外语译成本族语, 本族语译成外语。但是, 从广义来说, 翻译还包括方言与民族语, 方言与方言, 古代语与现代语之间的转换, 同时还包括把代表语言文字的符号或数码用语言文字表达出来, 如旗语 (флажный сигнал)、电码 (код) 等的翻译。

2. 翻译的标准

翻译的标准 (критерий оценки качества перевода) 是衡量译文质量的准绳和尺度。它是翻译理论的一个重要问题, 从古至今对此一直争论不休, 众说纷纭, 各执一词。

古罗马的西塞罗 (Cicero, 公元前 106 - 43 年) 认为, 翻译“不是字当句对, 而是保留语言的总风格和力量”。同时还指出, 正确的翻译是“按分量而不是按数量译词”。西塞罗开创了西方译论的先河, 而且一切“意译” (парафраза, вольный перевод) 的主张都是从这里一脉相承下来的。罗马帝国晚期的《圣经》翻译家哲罗姆 (St. Jerome, 公元 341 - 420 年) 认为, 文学用意译, 《圣经》用直译 (метафраза, дословный перевод)。此后, 西方翻译界围绕直译还是意译? 以形式为主还是以内容为主? 这两个方面展开了持久的论战。18 世纪末, 英国翻译理论家泰特勒 (Tytler 公元 1749 - 1814 年) 发扬了西塞罗开创的西方译论, 并将它推向了新的发展阶段。他提出了“翻译的三原则”: 第一, 译文应完整地再现原作的思想内容; 第二, 译文的风格、笔调应与原文的性质相同; 第三、译文应象原文一样流畅自然。本世纪 50 - 60 年代欧美结构主义语言学 (структуральная лингвистика, структурализм) 兴起之后, 出现了与之相呼应

的语言学翻译理论（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ая теория перевода）。从此，西方翻译界的这场论战表现为语言学翻译理论与文学翻译理论（литературоведческая теория перевода）之争。

在我国佛经翻译史上也有过直译与意译之说。东晋的道安（公元314-385年）主张直译。道安在主持译经工作时，发现汉语和梵文（санскрит）有很多不同之处，他主张“案本而传，不令有损言游字，时改倒装，余全实录。”他还总结出“译梵为秦有五失本三不易”。^①比道安较晚一点的鸠摩罗什（公元344-413年），是我国四大佛经翻译家之一^②。他本人是天竺人，公元401年来到长安，从此开始了他的译经生涯，先后翻译佛经74部384卷。罗什所译的经文，义皆圆通，“众心惬服，莫不欣赞”。他的一个名叫僧睿的弟子说过：“梵文委曲，师以秦文好简，裁（截）而略之。”故后人称他的翻译为“意译”。

唐代的玄奘（公元602-664年）取各家之长，弃各家之短，融直译与意译于一体，形成了一种精严、凝重的独特风格，深受世人的推崇，并称之为“新译”。玄奘由于“学力的深厚和对于梵华语文的透彻”，所以翻译起来“意思独断，出语成章”，“览文如己，转音犹响”。他提出了“既须求真，又须喻俗”的八字翻译标准和“五不翻”^③的原则。后人发现，玄奘译经时运用了种种翻译技巧，如：补充法、省略法、变位法、分合法、译名假借法、代词还原法等。

晚清时期，我国的翻译事业继佛经翻译之后，又呈现出繁荣景象。1894年，语言学家马建忠（公元1845-1900年）在《拟设翻译书院议》中提出了“善译”的主张：“夫译事之为难矣，译之将奈何？其平日冥心钩考，必将所译者与所以译者两国之文字，深嗜笃好，字栉句比，以考彼此文字孳生之源，同异之故，所有相当之实义，委曲推究，务审其声音之高下，析其字句之繁简，尽其文体之变态，及其义理精深奥析之所由然。夫如是，则

一书到手，经营反复，确知其意旨之所在，而又摹写其精神，仿佛其语气，然后心悟神解，振笔而书，译成之文，适如所译而止，而曾无毫发出入其间，夫而后能使阅者所得之益，与观原文无异，是则为善译也已。”马建忠的上述见解，确实非常精辟。

1898年，我国近代启蒙思想家、翻译家严复（公元1853—1921年），提出了“信、达、雅”三字翻译标准，他在《天演论》中译本“译例言”里写道：

“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

……此在译者将全文神理，融会于心，则下笔抒词，自然互备。至原文词理本深，难于共喻，则当前后引衬，以显其意。凡此经营，皆以为达，为达即所以为信也。

易曰：‘修辞立诚’子曰：‘辞达而已’。又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三者乃文章正轨，亦译事楷模，故信、达外，求其尔雅。此不仅期以行远耳。实则精理微言，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达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则达难……”

严复的这一提法几十年来对我国翻译界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一直作为翻译标准指导着许多人的翻译活动。然而他对“雅”字的解释是有错误的，引起了思想上的混乱，长期争论不休，难怪瞿秋白说，他用一个“雅”字打消了“信”和“达”。

鲁迅、瞿秋白对翻译发表过不少意见，是我国翻译理论的宝贵财富。瞿秋白在同鲁迅谈论翻译时指出：“翻译应当把原文的本意，完全正确的介绍给中国读者，使中国读者所得到的概念等于英俄日德法……读者从原文得来的概念，……应当用中国人口头上可以讲得出来的白话来写。”（《二心集》《关于翻译的通信》）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完”草》里，有段关于翻译的论述更是精辟、生动。他说：“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当然力求易解，一则保存原作的丰姿，但这保存，却又常常和易

懂相矛盾：看不惯了。不过它原是洋鬼子，当然谁也看不惯，为比较顺眼起见，只能改换他的衣裳，却不该削低他的鼻子，剜掉他的眼睛。”

1954年，中共中央编译局总结译校列宁著作的经验时，对严复提出的“三字”标准作了新的解释。提出“信”就是忠实、正确传达原著的思想、风格和精神；“达”就是用正确通顺的中文表达原著的思想、风格和精神。如果中国读者读译文就象外国读者读原文一样，那末可以说译文做到了“信、达、雅”三者统一的标准了。这一论述把“信达雅”三者的关系辩证地统一起来了，但对“雅”的解释比较含混。因此，当时有人主张从原著相互依存的思想、语言、风格三个方面来说明“信达雅”，认为“信”就是完全确切地表达原著的思想，“达”就是译文语言应合乎本民族语言的规范，“雅”就是保存原著的风格。

后来，有人主张，为了避免“信达雅”这个旧形式所引起的无休止的争论，提出了“忠实、通顺”的四字标准。他们认为，这一提法与“既须求真，又须喻俗”的精神是一致的；所谓“忠实”，既忠实于原著的内容，也忠实于原著的风格。

傅雷和钱钟书在谈论文学翻译时，提出了“神似”和“化境”之说。翻译家傅雷把翻译比作临画，“所求不在形似而在神似”^{*}。他认为，翻译比临画更难，因为临画与原画在素材、法则方面是相同的，而译作与原作，文字不同，规则（指语法）也不同，于是他得出结论：“以甲国文字传达乙国文字所包涵的那些特点，必须象伯乐相马，要‘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钱钟书在《林纾的翻译》一文里说：“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译成另一国文字，既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那就

* 傅雷《〈高老头〉重译本序》，1951年9月。